

中东欧政治转轨 30 年

——对转轨进展的观察与思考

高 歌

【内容提要】 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指的是国体上向资本主义、政体上向西
方民主政体的转轨。国体转轨随东欧剧变结束而完成，政体转轨则需要更长的时
间。根据不同的评估标准，对政体转轨的进展可作出既大体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判
断。经济转轨、外交转轨和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构建与政治转轨同时进行，直接作
用于政治转轨进程。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呈现正相关关系。外交转轨对政治转轨
发挥明显的导向和驱动作用。国家构建作为政治转轨的前提条件，影响了转轨进
度。实行了 40 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乃至之前更久远的历史沿革则构成了政治转
轨的底色，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中东欧 政治转轨 经济转轨 回归欧洲 国家构建

【作者简介】 高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

1989 年，东欧国家^①发生剧变，走上政治转轨^②的道路。30 年来，政治转轨
进展如何？又何以会有如此的进展呢？本文集中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政治转轨进展如何？

政治转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国体和政体。1989 年开始的东欧剧

^① 指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联邦
8 国。剧变后，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联邦先后解体为 6 个国家，
东欧 8 国演变为中东欧 13 国，即本文所讨论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
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北马其顿。

^② 一般来说，“转轨”与“转型”两个概念可交替使用，尽管从严格意义上看，两个概念有所不同。
参见朱晓中：《转型九问——写在中东欧转轨 20 年之际》，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6 期。

变，通过否定共产党领导，举行自由选举，取消国名中“社会主义”和/或“人民”的字样，及至颁布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完成了国体层面上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同时开始了政体层面上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

相对于国体转轨，政体转轨要复杂得多，耗时也长得多，这增加了评述其进展的难度。鉴于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以西方民主政体为蓝本，或可借用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和标准观察中东欧各国的政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与西方的趋同^①。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② 塞缪尔·亨廷顿认同熊彼特的观点，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选举是民主的本质。”^③ 据此，西方学者用政权“两度易位”标准来判断西方民主政体是否确立，即在转轨阶段的首次选举中赢得政权的政党或团体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失利，把权力让渡给那些选举的赢家，并且后者又和平地把权力让渡给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者^④。以此评估中东欧国家政体转轨的进展，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已完成了政权“两度易位”，且完成的时间不尽相同（见表1）。

不过，就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是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民主具有或者应该具有涵盖性广得多的和更富有理想的相关含义。”^⑤ 罗伯特·达尔把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归结为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表达意见的自由，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社团的自治和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并将这种制度称作“多元”民主^⑥。拉里·戴蒙德则将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加以区分，认为选举民主是当代民主的底线定义，自由民主在

① 借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并不意味着对它们的认同，相反，由于中东欧政治转轨的目标模式是西方政体，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是为了客观反映中东欧各国政体与西方的趋同度，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其本质。

② [美]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第5、6页。

④ See John S. Dryzek and Leslie Templeman Holmes, *Post-Communist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Discourses across Thirteen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

⑤ [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第8页。

⑥ [美]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4~95、98页。

表1 中东欧国家政权的“两度易位”

国家	首次选举		第一次易位		第二次易位	
	年份	主要执政党	年份	主要执政党	年份	主要执政党
波兰	1989	团结工会	1991	中间派协议会	1993	民主左派联盟
匈牙利	1990	民主论坛	1994	社会党	1998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 匈牙利公民党
斯洛文尼亚	1990	“德莫斯”联盟	1992	自由民主党	2004	民主党
克罗地亚	1990	民主共同体	2000	社会民主党、 社会自由党	2003	民主共同体
罗马尼亚	1990	救国阵线	1996	民主协议会	2000	社会民主主义党
捷克斯洛伐克	1990	公民论坛 公众反暴力				
保加利亚	1990	社会党	1991	民主力量联盟	1994	社会党
马其顿	1990	内部革命组织— 争取马其顿民族 统一民主党	1994	社会民主联盟	1998	内部革命组织— 争取马其顿民族统 一民主党、民主选择党
阿尔巴尼亚	1991	劳动党	1992	民主党	1997	社会党
南斯拉夫联盟	1992	塞尔维亚社会党、 黑山社会 主义者民主党	2000	塞尔维亚 民主反对派、 黑山社会人民党		
斯洛伐克	1994	争取民主 斯洛伐克运动	1998	民主联盟	2006	方向—社会民主党
捷克	1996	公民民主党	1998	社会民主党	2006	公民民主党
黑山	2006	黑山社会 主义者民主党				
塞尔维亚	2007	民主党	2012	前进党		

*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转轨阶段的首次选举在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前举行，1991年年底波黑、塞尔维亚、黑山也举行了选举。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黑山共产主义者联盟分别在各自共和国的选举中获胜执政。其中，塞尔维亚社会党一直执政到2000年才被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取代，黑山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演变而来的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始终是黑山的执政党。波黑独立后不久即陷入战争，直到1995年年底“代顿协议”签署。尽管自“代顿协议”签署以来进行了8次大选，但由于波黑部长会议的组成要兼顾民族原则，并非像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单独或联合其他政党组阁，而是由进入议会的主要政党协商，组成几乎所有主要政党参加的大联合政府，所以至今没有形成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

* 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前相继于1990年和1992年与联邦议会同时进行了民族议会选举，公民论坛及其分裂而来的公民民主党和公众反暴力及其分裂而来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成为主要执政党。

* 由原执政党改名或分裂而来的政党赢得接下来的选举并继续执政不能算作政权易位，如1992年捷克公民民主党和斯洛伐克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1992年由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分裂而来的民主救国阵线、2002年由斯洛伐克民主联盟部分成员成立的民主基督教同盟等。

其之上还应具有多种特征，这些特征恰是“自由之家”在对世界各国的年度自由调查报告中使用标准，因此，“‘自由之家’对自由度的调查是目前现有的有关自由民主的最好的经验指标。”^①按照戴蒙德的观点，用“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观察中东欧国家政体与西方政体的趋同度，可以看出，2006年，中东欧13国中阿尔巴尼亚、黑山、马其顿^②和波黑为部分自由国家，其他9国都已步入自由国家行列，且除波黑外，其余国家均实现了选举民主（见表2）。此外，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也反映了中东欧国家政体的状况。据2006年指数，各国的趋同度与“自由之家”的评估大体相似，捷克已建成完全民主政体，阿尔巴尼亚和波黑尚是混合政体，其他10国均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见表3）。

表2 “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中东欧国家）

国家	2006			2018		
	政治权利	公民自由	评级	政治权利	公民自由	评级
捷克	1	1	自由	1	1	自由
匈牙利	1	1	自由	3	3	部分自由
波兰	1	1	自由	2	2	自由
斯洛文尼亚	1	1	自由	1	1	自由
斯洛伐克	1	1	自由	1	2	自由
保加利亚	1	2	自由	2	2	自由
克罗地亚	2	2	自由	1	2	自由
罗马尼亚	2	2	自由	2	2	自由
塞尔维亚	3	2	自由	3	3	部分自由
阿尔巴尼亚	3	3	部分自由	3	3	部分自由
黑山	3	3	部分自由	4	3	部分自由
马其顿	3	3	部分自由	4	3	部分自由
波黑	3	3	部分自由	4	4	部分自由

资料来源：Arch Puddington, “The 2006 Freedom House Survey: The Pushback Against Democracy”,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8, Number 2, April 2007, pp. 128 - 129; Nate Schenkkan, Sarah Repucci, “The Freedom House Survey for 2018: Democracy in Retreat”,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0, Number 2, April 2019, pp. 104 - 105.

* 1代表最自由，7代表最不自由。两项平均得分在1.0~2.5之间的为自由国家，3.0~5.0之间的为部分自由国家，5.5~7.0之间的为不自由国家。

* 2006年除波黑外均为选举民主国家；2018年除马其顿和波黑外均为选举民主国家。

① 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2、395~396、397页。

② 2019年2月，马其顿改名为北马其顿。

表3 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中东欧国家）

国家	2006		2018	
	总分	政体类型	总分	政体类型
捷克	8.17	完全民主	7.69	有缺陷的民主
斯洛文尼亚	7.96	有缺陷的民主	7.50	有缺陷的民主
匈牙利	7.53	有缺陷的民主	6.63	有缺陷的民主
斯洛伐克	7.40	有缺陷的民主	7.10	有缺陷的民主
波兰	7.30	有缺陷的民主	6.67	有缺陷的民主
保加利亚	7.10	有缺陷的民主	7.03	有缺陷的民主
罗马尼亚	7.06	有缺陷的民主	6.38	有缺陷的民主
克罗地亚	7.04	有缺陷的民主	6.57	有缺陷的民主
塞尔维亚	6.62	有缺陷的民主	6.41	有缺陷的民主
黑山	6.57	有缺陷的民主	5.74	混合政体
马其顿	6.33	有缺陷的民主	5.87	混合政体
阿尔巴尼亚	5.91	混合政体	5.98	混合政体
波黑	5.78	混合政体	4.98	混合政体

资料来源：“Democracy Index 2018: Me to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otest and democracy, A report b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see from http://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Democracy_Index_2018.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2018, pp. 41-42.

* 大于8为完全民主，大于6小于等于8为有缺陷的民主，大于4小于等于6为混合政体，小于等于4为威权政体。

西方国家学者对他们所实行的民主政体的认识并未止步于此。如威亚尔达所说：“许多国家的民主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命题，而是一个连续体，一段旅程，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① 在论述这一过程时，一些学者提出“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概念^②。胡安·J. 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指出：“完成民主转型的绝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得到巩固之前，仍然需要完成很多任务，需要创造很

①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② 参见[加] A. 布来顿等：《理解民主：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毛丹等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0页；[美] 胡安·J. 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美] 詹姆斯·F. 霍利菲尔德、加尔文·吉尔森主编：《通往民主之路：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何志平、马卫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272页；[英] 罗伯特·拜德勒克斯、伊恩·杰弗里斯：《东欧史》（下册），韩炯等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871~872页。

多条件，必须培养许多态度和习惯。”^① 亨廷顿则担心：“巩固民主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在一些国家维持民主的条件不够充分的地方出现倒退。”^② 林茨和斯泰潘甚至不排除巩固的民主政体崩溃的可能性^③。基于上述认识，可把中东欧国家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看作是一个远未完成，或许会倒退乃至崩溃的漫长历程。

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目标，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大都出现了倒退的迹象^④。2018年与2006年相比，从“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看，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或公民自由评分有所下降，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由自由国家降格为部分自由国家，马其顿不再被认定为选举民主国家（见表2）；从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看，除阿尔巴尼亚的评分略有上升外，其余12国均有下降，其中匈牙利、黑山和波黑降幅最大，捷克由完全民主政体降格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黑山和马其顿由有缺陷的民主政体降格为混合政体（见表3）。

怎样认识中东欧国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轨过程中的倒退呢？

其一，虽然中东欧国家大都出现倒退，但它们没有倒退到“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评级中的不自由国家或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评级中的威权政体。从这点上看，它们尚未构成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回潮”^⑤。

其二，倒退并非中东欧国家独有，而几乎成了全球的普遍趋势。2018年，“自由之家”年度调查记录了连续13年来整个世界的自由的衰退^⑥。经济学人智库也展示了世界平均民主指数的下降，尤以东欧和西欧的下降最为显著（见表4）。西方国家学者承认这种趋势。雅克·鲁尼克和让·齐隆卡指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可能对民主产生有害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民粹主义政治在整个大陆崛起，威权主义倾向在多个国家重新浮出水面。”^⑦ 安德鲁·甘布尔也指出：“1945年后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显著增长，但在过去10年

① [美] 胡安·J. 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5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第353页。

③ 参见 [美] 胡安·J. 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6页。

④ 此处所说的倒退是相对于中东欧国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轨的目标而言的客观描述，而非价值判断。

⑤ 有关“第三波回潮”的论述，参见 [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第353~358页。

⑥ 参见 Nate Schenkkan, Sarah Repucci, “The Freedom House Survey for 2018: Democracy in Retrea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0, Number 2, April 2019, p. 100.

⑦ Jacques Rupnik, Jan Zielonka, “Introduction: The State of Democracy 20 Years on: Domestic and External Factor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ume 27, Number 1, February 2013, p. 3.

的金融危机和财政紧缩中，民主再次开始收缩。”^①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本就是与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政体的趋同，而当中东欧和西欧同时出现倒退时，是不是意味着中东欧与西欧是另一种形式的趋同呢？

其三，如威亚尔达所认为的，在西方民主的核心原则之外，“根据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同，在民主的形式、制度和实践上存在着大量的变化”^②，中东欧国家所谓的倒退可否被看作是改变之前照搬西方民主政体的做法，对更符合本国实际的政体模式的探索呢？进一步说，“一种完全本地化、土生土长的民主模式是否可能？”“大多数国家如何将它们本地的传统和行为方式与外来的模式和压力相融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仍有可能实行其独特的民主？”^③ 认识中东欧国家政体转轨进程中的倒退，威亚尔达之问不能回避。

表 4 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世界不同地区）

	2006	2018
亚洲 & 大洋洲	5.44	5.67
东欧	5.76	5.42
拉丁美洲	6.37	6.24
中东 & 北非	3.53	3.54
北美	8.64	8.56
西欧	8.60	8.35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4	4.36
世界平均	5.52	5.48

资料来源：“Democracy Index 2018: Me to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otest and democracy, A report b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see from http://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Democracy_Index_2018.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2018, p. 10.

* 东欧不仅包括本文所述的 13 国，还包括由苏联解体而来的国家。

二 政治转轨何以如此？

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始于相同的起点——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相同的目标——国体上的资本主义和政体上的西方民主政体。然而，30 年间，中东欧国

① Andrew Gamble, “A Second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ume 90, Issue S2, April – June 2019, p. 326.

②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第 177 页。

③ 同上，第 18 页。

家政治转轨，尤其是政体转轨进程却不尽相同，不仅进度有快有慢，甚至转轨的目标也不再完全一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就公开宣称要民主，不要自由主义^①。何以如此？

如同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中东欧政治转轨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探知影响政治转轨的全部因素、判断某种或某些因素在某一国转轨或转轨的某一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也超出了一篇论文所能涵盖的容量。但至少应在地区层面上考察和分析影响政治转轨30年历程的两类因素——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

（一）伴生因素

中东欧政治转轨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从追随苏联^②到“回归欧洲”^③的外交转轨以及从联邦国家到新的主权国家的国家构建^④同时进行，经济转轨、外交转轨和国家构建对政治转轨的影响直接而显著。

经济转轨^⑤与政治转轨呈现正相关关系。如亚当·普沃斯基所说：“新的民主制度的生存，不仅依赖于其制度结构和主要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⑥转轨初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种转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人口陷入贫困，贫富差距将不断地加剧。”^⑦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衰退极易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各党派为推卸责任相互攻击，政局波动和社会动荡时有发生，削弱了民众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信任和向往，不利于政治转轨的进行。不过，随着经济转轨走出困境，它对政治转轨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弱。毕竟，“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所造成的社会，它所引起的、为它所特有的经济增

① “‘Yes’ to democracy, ‘no’ to liberalism”, July 28, 2019. <http://www.kormany.hu/en/the-prime-minister/news/yes-to-democracy-no-to-liberalism>

② 南斯拉夫联邦和阿尔巴尼亚是例外，两国先后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60年代脱离苏联阵营。

③ 特指加入北约和欧盟。

④ 特指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一系列主权国家建立。

⑤ 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中东欧国家已经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经济转轨。但经济转轨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新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尚需不断改革。（参见孔田平：《中东欧经济转轨30年：制度变迁与转轨实绩》，载《欧亚经济》2019年第3期。）鉴于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评估，除捷克在2007年年底达到转轨先进国家标准外，直到2018年，其余12国与标准的可持续市场经济之间仍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2018-19”，<https://www.ebrd.com/news/publications/transition-report/transition-report-201819.html>），笔者认为，可从广义上将经济转轨看作是一个尚未结束的进程。

⑥ [美] 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⑦ [丹] 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孙友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14页。

长，这一切，对于发展和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① 在中东欧，经济转轨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乃至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并在此基础上组成有固定阶层或阶级支持的政党，推动政治转轨不断深入。然而，“正当 21 世纪初新自由主义改革似乎在长期的转轨衰退后最终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时，2008 年全球经济崩溃又把中东欧国家推回到危机之中”^②。再次到来的经济衰退引发政局不稳和民众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不满，中东欧政体转轨的倒退与此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匈牙利，急剧的经济下滑加剧了国内对过度开放的反感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其走上非自由民主道路，成为转轨倒退最为严重的中东欧国家。

外交转轨对政治转轨的作用极为显著。“和平和安全被视为成功的民主巩固的先决条件。在此，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美国及其主要机构支柱北约的和平保障作用最为重要，特别是在民主转型初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成为关注的中心。当大陆地缘政治重心东移时，制度重心向西移动。……（北约和欧盟）都把民主作为加入它们的首要条件……在中东欧，起初，北约主要与民主价值观有关，欧盟则主要与市场和法律规范有关。而在现实中，北约的民主化贡献集中在军事机构及其对民选政府的明显从属地位，欧盟则在中东欧入盟前的漫长 10 年间发展成更广泛和深刻的‘转型力量’，成为该地区主要的来自外部的民主化动力。”^③ 的确，中东欧国家入盟的迫切愿望使得欧盟提出的加入条件和成员资格的确定前景对其政治转轨具有明显的导向和驱动效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转轨的进度^④。也正因如此，“在入盟条约即将签署之时或一旦签署入盟条约，（欧盟的）条件性便失去了影响力。”^⑤ 加之欧盟对成员国的惩戒措施有限^⑥，也几乎不可能取消它们的成员资格，中东欧成员国获得了一定的倒退空间。不止于

① [美]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 167 页。

② Mitchell A. Orenstein, “What Happened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ies? A Balance Sheet for Neoliberal Refor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ume 23, Number 4, Fall 2009, p. 479.

③ Jacques Rupnik, Jan Zielonka, “Introduction: The State of Democracy 20 Years on: Domestic and External Factors”, p. 11.

④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98 年 3 月欧盟启动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入盟谈判，斯洛伐克受此驱动，采取了举行自由的市政选举、解决总统选举危机、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法、起草保证司法独立的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符合欧盟要求的行动。

⑤ Tobias Böhmelt, Tina Freyburg,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the Credibility of EU Conditionality and Candidate State’ Compliance with the AcquisCommunitaire, 1998 – 2009”,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ume 14 Number 2, June 2013, p. 267.

⑥ 尽管欧盟已相继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对波兰和匈牙利启动《欧洲联盟条约》第七条规定的程序，按照该程序，如认定一国存在严重和持续违反欧盟价值观的情形，可中止其理事会成员投票权，但此认定需要欧洲理事会一致同意，而波兰和匈牙利已表示要在投票中相互支持，该程序几乎不可能进行到底。

此,近年来,欧盟遭遇多重危机,自身发展陷入困境,吸引力大为下降,“民粹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浪潮成了跨欧洲乃至跨大西洋的现象”^①。这多少鼓舞了中东欧的倒退,以致欧尔班在2017年不无自豪地说:“在27年前的中欧,我们相信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但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欧洲的未来。”^②

国家构建的影响在中东欧新独立国家政治转轨中十分突出^③。林茨和斯泰潘对国家构建之于政治转轨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现代政治实体(modern polity)可以民主地得到巩固,除非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因此,国家不存在,或者国家高度缺乏认同,某一地域上的大量群体和个人试图加入另外的国家,或者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这时会产生根本性的并且常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④就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建立的一系列主权国家而言,国家构建作为政治转轨的前提条件,直接影响了它们的转轨进度。首先,独立越早的国家,越有可能较早走上政治转轨道路并取得进展。原南斯拉夫地区6国中,斯洛文尼亚最早提出独立要求,政治转轨进度最快;黑山则因为迟迟得不到独立,独立议题占据大部分政治空间,议会选举和政党竞争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以致转轨缓慢。其次,和平构建的国家,政治转轨较为顺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很好的例证。相反,在波黑,不仅三年多的战争打断并延迟了政治转轨,而且战争的结束并未给它带来真正的主权。时至今日,波黑仍处在国际社会监管之下,其政治转轨一直在国际社会保护、主导甚至直接参与下进行。再次,认同程度高的国家,政治转轨进度快。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国内的主体民族分别占总人口的81.5%和83%,捷克和克罗地亚的主体民族更是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⑤,国家认同程度高。相比之下,波黑、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则不同程度地存在

① Jacques Rupnik, “Explaining Eastern Europe: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9, Number 3, July 2018, p. 35.

② “Full Speech of V. Orbán: Will Europe Belong to Europeans?” *Visegrad Post*, 24 July 2017, <https://visegradpost.com/en/2017/07/24/full-speech-of-v-orban-will-europebelong-to-europeans>, 转引自 Jacques Rupnik, “Explaining Eastern Europe: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p. 36.

③ 有学者认为,新独立民族国家中的多数虽然从诞生之日起就基本上按西方模式框架进行国家构建,但基础都是原来苏联模式的国家母体,因此,它们的新国家构建可能也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但新国家构建是主要的,社会转型则是从属的。(参见孔寒冰:《社会转型、新国家构建和社会发展——“原苏东地区”近30年状况的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笔者认为,虽然从广义上讲国家构建涵盖了转型进程,但就国家构建的特定含义而言,它解决的是林茨和斯泰潘所说的“国家性”问题,即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地理边界和谁在这个国家拥有公民权利的分歧政治转轨与国家构建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行的两个进程。

④ [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7页。

⑤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

国家认同问题。尤其是波黑，三个主要民族在有关波黑发展的基本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严重阻碍了政治转轨进程。

（二）初始因素

如格热戈日·爱柯尔特和丹尼尔·齐布拉特所言：“1989~1990年戏剧性的转轨时刻、成功和失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国家构建模式以及与欧盟的不同关系的确在重要方面塑造了共产主义之后的民主化轨迹。但这些当代的力量看来只是在各种不同的前共产主义遗产的混合物的框架内发挥作用，这些遗产似乎为该地区可能发生的事情设定了外部界限。”^① 伴生因素直接影响政治转轨进程，初始因素则构成了政治转轨的底色。

中东欧政治转轨的起点是实行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南斯拉夫联邦外的中东欧国家，该制度以苏联模式的面貌出现^②。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东欧的确立和巩固，但对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是苏联在冷战爆发的特定条件下为加强对中东欧的控制强制推行的，不仅不适应中东欧国家的实际，而且伤害了中东欧人民的民族感情，加之苏联模式本身包含着严重的矛盾和弊端，以致中东欧国家对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反感日益强烈，终致不加区分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剧变^③。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政体的对立面，必然不能为其确立和巩固提供条件。

对初始因素的讨论不应局限于社会主义时期，而应延展到社会主义之前更久远的历史。爱柯尔特甚至认为：“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长期历史遗产现在被赋予了比最近的共产主义遗产更强的解释力。”^④ 归根结底，“民主不仅仅是那么一点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它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哲学甚至宗教之中，与这些因素密不可分。”^⑤ 中东欧虽然与西欧一样拥有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文化渊源，但随着罗马帝国分裂特别是基督教会分裂，受拜占庭文化影响、信仰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开始与西欧分道扬镳。及至奥斯曼帝国兴起，这

^① Grzegorz Ekiert, Daniel Ziblatt,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ne Hundred Years 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ume 27, Number 1, February 2013, p. 92.

^② 苏南冲突后，南联邦抛弃苏联模式，转而实行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

^③ 南联邦的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强调放权，致使权力过于分散，联邦国家越来越难以维系。其剧变因而不像其他中东欧国家那样表现为抛弃苏联模式，而是放弃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联邦国家解体。

^④ Grzegorz Ekiert, “Three Generations of Research on Post Communist Politics – A Sketch”,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ume 29, Number 2, May 2015, p. 327.

^⑤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第7页。

一地区更与西欧渐行渐远，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徒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地区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它们没有体验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① 相比之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中欧地区从未完全与西欧分离，波兰则有更多与西欧共同的经历。及至一战结束、中东欧国家独立，匈牙利继短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后，在君主立宪制的名义下开始了霍尔蒂·米克洛什的独裁统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采用议会共和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阿尔巴尼亚则陷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封建专制的斗争之中，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各地的民主理想看来都已被弄得污点斑斑，无法挽回”^②。可见，并非所有中东欧国家都有与西欧相似的民主历程，“民主制度（与人们希望的相反）在共产主义统治之前不是‘常态’。……人们对民主制度既熟悉，又缺乏实际的经验，这两者的结合主导了1989年之后的政治发展。”^③ 一般来说，与西欧发展更为相近的中欧国家比远离西欧的巴尔干国家拥有更为顺畅和迅速的政治转轨，“那些可以回归共产党政权之前业已存在的自由民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国家，将比那些在历史上以共产主义制度取代另一种独裁制度的国家，享有更为稳固的民主合法性。”^④ 近年来的转轨倒退也似乎与西方民主观念和民主传统薄弱不无关联。

政治转轨根本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造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30年来，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则因不同的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进度和样貌。总体而言，多数中东欧国家与它所追求的西方民主政体之间尚存或多或少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近年来还有扩大的趋势。考虑到民粹主义力量在西欧抬头，中东欧政治转轨的倒退或许会与其相互影响，共同对西方民主政体构成挑战。当然，对于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事件，本文的论述只是一鳞半爪。而要尽揽政治转轨全貌，探寻其深层原因，乃至预测其前景，恐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尚需学界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 陆齐华）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第363页。

② [英] 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于亚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7~218页。

③ [英] 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④ [丹] 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第16页。